

超越傳統與現代

—— 柯文論王韜與中國晚清改革

• 雷 頤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現代化不是賽馬

人們經常把近代中國和日本作一對比，認為在追尋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成功」了，中國「落後」了。這種比較是必要且有益的，但卻有一定的危險性。作者柯文在本書提醒人們：「跨文化比較是樁撲朔迷離之事。對確認異同雖極有價值，但作為衡量變化的尺度（變化速度）卻頗有問題。現代化畢竟不是賽馬。即便兩種文化碰巧都處於『前現代』狀況，也並沒有共同的『起跑線』。」的確，人們在進行比較時，往往忽視了中日兩國一些甚為

重要的不同方面。例如，明治維新前日本的社會經濟結構，與其說與中國開關前的「封建社會」類似，不如說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更為相近。所以作者認為「以內在參考點作為衡量十九世紀中國的變化尺度是一更為恰當有效的方法。直到我們把1900年的中國與1800-1840年的中國作一比較時，我們才能理解變化之深廣」。在這一巨大變化，尤其是中國精神世界的變化中，王韜起了重大的作用，代表了中國「新人」的誕生。作者認為王韜一代比孫中山一代更新，因為王韜誕生時（1828年）中國還「一無所有」，而正是靠這一代人的努力，使孫中山誕生時（1866年）中國已孕育了革命。以「內在取向」作為研究近代中國的參考點，自然使作者對當時尚頗流行的「傳統—現代」的兩分法提出異議。「傳統—現代」這一理論框架，自有其重要的意義與闡釋力。

跨文化比較是樁撲朔迷離之事。對確認異同雖極有價值，但作為衡量變化的尺度卻頗有問題。現代化畢竟不是賽馬。即便兩種文化碰巧都處於「前現代」狀況，也並沒有共同的「起跑線」。

王韜一再呼籲中國進行種種富國強兵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以西方的方式回答西方的挑戰。



近代中國最有意義的精神變化之一，是「中國中心」世界觀的破滅，「天下」觀讓位於一種民族國家觀。

但隨着研究的深入，這一框架的不足與弊病日益明顯。作者寫道：「我們沒有理由把自己局限於『現代』與『傳統』這兩個範疇之間，大概每個社會的組成原素中，總有些東西並不能正好符合這兩個成例。」「傳統」與「現代性」從本質上說，是從組成現實的「變量的連續統一體」中抽象出來的，是為了研究目的而放大的單一框架，「與所有歷史概念一樣，它們與人類經歷的實際記錄的關係是含糊不清的。很清楚，在它們的簡化過程中，那些被它們所解釋之物，也就被誤傳了。」

作者還指出，在用「傳統」研究中國的過去時，中國人與西方人都易將其「漫畫化」。因為在現代中國人眼中，「傳統」並非僅是一種簡單、客觀的編組概括，而是某種與每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感情衝動對象，或是無情批判，或是無限讚稱，或是激烈反對，或是真誠信仰，許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想用它來達到其他目的。「從學術角度看，

對傳統的這些觀點都是真實過去的漫畫化。」作為西方人，作者對「來自西方人」的漫畫化更為重視。西方人在研究中華文明時，「作為一種浪漫的異國情調誘人遺產的受惠者，極易把另一種文化中與自己文化的不同之處抽出來，稱之為『獨特的』。」而與西方文化的許多相同之處，卻被這些研究者忽略。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許多明顯不同之處又加強了這種傾向。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由於它們並非僅是「中國的」或無法歸之於「傳統的」，因而不為人注意。作者認為，這種不同文化的共同方面可能更有意義。其一，「我們可以從中對人類對人性的內在困境的基本反應作一反思，所以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超文化的。而另一點則是，我們無疑可以很有把握的設定，在中國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相重合的地方，近代中國須要拋棄的那些先前思維習慣較少，而應更多地強調連續性或復興。」

在對王韜的世界觀進行研究時，作者有意突出了這些無法完全歸之於「中國的」或「傳統的」因而不被人注意的方面。

「德」與「力」和「天」與「人」

無疑，近代中國最有意義的精神變化之一，是「中國中心」世界觀的破滅，「天下」(中華文明)觀讓位於一種民族國家觀。

1848年春，王韜離開家鄉，來到「華洋雜處」的上海。不久，應傳教士麥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之聘，到新

教倫敦會辦的「墨海書館」任編輯，協助聖經的翻譯工作。由此，王韜開始了對「西學」由淺至深的了解，開始了由文化世界觀向民族國家世界觀的艱難而深刻的轉變。

對時務的關心與對西學的了解，促使王韜較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但此時王韜仍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①。但60年代初與太平軍暗中聯絡之事猝然敗露，王韜只得避居香港。其間，王韜到英法遊歷逾兩年之久，對西方文化有更為直觀真切的親身體會。作者對這期間王韜的大量文稿、書信進行了細緻的爬梳整理，使王韜精神世界的變化鮮明凸現出來。

1865年，王韜在代一位友人擬寫的上李鴻章書中，反覆強調要與西方國家進行商品競爭，要「握利權」「樹國威」。這是他思想轉換的重要標誌。在歐洲遊歷期間，他又將儒學與基督教作一比較^②：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系乎人而已。……前聖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

「道」是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是一種超越的終極真理。作者認為，王韜的「道」的普遍觀念，頗具革命性，突破了「中國／道——西方／器」這種模式，為中國的世界

模式注入了新的因素，「它使西方進入中國的話語(discourse)世界，無論是否願意，在這一過程中它為中國不僅僅是從西方借「器」提供了理論根據。」那麼，這種混淆「夷夏之防」的「道」的普遍論，是否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理論根據時，對儒學作了一種消亡性解釋呢？作者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從前也曾發生過的儒學教義的激烈變革，並未導致這一傳統的終結。很可能，無論是漢儒還是宋儒，都不被承認為真正的儒家，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自視是這位聖人的真正傳人。同樣，擺在我們面前的情況是，可能我們無法斷定王韜對儒學的隨意處置在客觀上是否會導致儒學的不幸，我們能有把握的只是，王韜依舊自視為一位儒家。」

「道」是普遍的又潛藏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這種觀點。這樣，在「萬邦紛爭」的現實國際環境中，起決定作用的並非「道」德，而是「力」。作為一個對世界大勢了解甚多的近代中國人，王韜陷入了「德」與「力」的矛盾中。

但作者指出，這種矛盾並非王韜所獨有，實際上自孟子將政治分為「以德服人」的「王道」和「以力服人」的「霸道」起，中國政治就存在着「德」與「力」的矛盾。從理論上說，聖主明君應「以德服人」，但在實際政治中，卻無不「以力服人」。這種理想與現實間的「張力」，在王韜的論著中更為尖銳地表現出來。在許多文章和論著中，王韜向人們宣示了弱肉強食毫無道德可言的世界圖景，反覆表明這樣一種觀點：「國強則公法我得而廢之，亦得而

王韜的「道」的普遍觀念，突破了「中國／道——西方／器」這種模式，它使西方進入中國的話語世界，為中國不僅僅是從西方借「器」提供了理論根據。

王韜反覆強調「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恰恰是為了使中國強盛，這種混合將使中國在開始時以西方的方法對西方作出回應，但最終將迫使西方以中國的方法對中國作出回應。

興之：國弱則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為我用。嗚呼！處今之世，兩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強。」^③因此，王韜一再呼籲中國進行種種富國強兵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以西方的方式回答西方的挑戰。結論必然是，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中，只有「不道德」才能生存下去。這卻又是仍以儒生自命的王韜所難以接受、承認的。作者認為，中國人「最終並不滿足於僅僅取得富強」，而是「中國如何才能又與西方有別」。王韜亦反覆強調「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恰恰是為了使中國強盛，而中國的復興即是「道」的復明，「六合將混為一」。作者認為「在此我們可得到關於中國如何才能最終區別於西方這一問題的啟示。一個徹底變更的中國將與西方一樣強大，但中國仍將是道德的，而西方則不是。這種混合將使中國在開始時以西方的方法對西方作出回應，但最終將迫使西方以中國的方法對中國作出回應。」

沿海與內地

在對王韜的教育、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變革思想作了研究之後，作者在最後一章中筆鋒一轉，從個人性傳記轉為集體性傳記，對與王韜大致同時的幾位改革者作一整體素描，探討了近代中國沿海(Littoral)與內地(Hinterland)的複雜關係。

在本書中「沿海」與「內地」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性概念，而更是一種文化性概念。相比較而言，「沿海」

的經濟基礎是商業勝於農業，行政和社會管理方面是現代性多於傳統，思想觀念上是外向的勝過內向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勝過中國的(儒學)。

按作者分類，容闈、何啟、唐景星和伍廷芳等是最為典型的「沿海人物」，王韜、鄭觀應、馬建忠和馬相伯則屬與「內地」有緊密文化聯繫的「沿海人物」，而馮桂芬、薛福成、黃遵憲和郭嵩燾等雖與「沿海」或西方有密切聯繫，但本質上是「內地」的。從經歷上看，「沿海人物」中有半數得到外國大學學位或受聘於外國人，且只有王韜取得過「秀才」資格，另一半則有長居國外的經歷，除王韜外，多數都能說一種或一種以上的西方語言。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如報人、牧師、律師、近代企業家等是傳統中國所沒有的，許多人更曾從事過多種職業。而且，他們都是在經歷了「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並在各不相同的職業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後才進入官場的。相反，「內地」改革者都有功名，都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而未曾進入過外國學校或受聘於外國人，除馮桂芬外，他們從前都可說是「職業官僚」，是在官位上才開始注意西方和開始思想變化的。

然而，沿海改革者畢竟與中國社會現實差異過大，因此，他們只有經過一種「通道」，才能對內地發生作用。作者寫道：「這是沿海改革者面臨的困境。如果他們要在沿海範圍之外產生影響，就必須獲得通向內地權力結構的入口。但既然這種權力結構充滿了大量的傳統價值、目標和行為方式，那麼他們進

入這種權力結構時就得冒着改革者形象不是消失就是被沖淡的危險。」他們多數都曾入李鴻章門下，使李鴻章成為「沿海」進入「內地」的主要通道。但他們在李鴻章麾下並不如意，處處受到掣肘。就思想內容而言，「內地改革者」與「沿海改革者」十分相似。但前者雖然受後者的影響，他們卻不是「沿海文化」的產物，只是這種文化的觀察者和思考者，而不是參與者。與「沿海改革者」相比，他們可說是身居晚清權力結構之中，但作用依然十分有限。似可借用作者對權傾一時的李鴻章的一句話來說明：「但當他掌握這種制度時，也就成為這種制度的奴隸。」

作者將文化的全面變革分為「開拓」與使之「合法」這兩個階段。在第二階段，「佔支配地位的傳統主義者顯然轉而適應由來已久的變革需要，但他們始終堅持這些變革應冠以某種固有的合法性。」換句話說，一種全面的創新，最終還要以一定的傳統因素為依托才能成功。作者指出，在中國近代，這兩個階段就表現為「沿海」對「內地」的不斷衝擊。「內地」使這種衝擊合法化的，便是洋務官僚和「內地改革者」。「衝擊」能否成功，決定於其能否「合法化」。在中國近代，「只要兩者的功能不能彼此取代（或者至少不好完全取代），那麼這兩種文化的共生關係就是持續的。一旦內地除了使變革合法化之外也成為另一種創新的中心，那麼沿海的作用就衰退了。二十世紀下半期的上海和廣州位置依舊，在地理和經濟上仍屬「沿海」，但在文化上，卻被

變成一種新的中國內地。」

在此書出版至今的近二十年中，柯文先生的思想當然有進一步的發展和變化。他在此書中對「西方挑戰—中國應戰」模式的異議，已經形成為一種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即「在中國發現歷史」，從中國的視角來看近代中國。筆者近日譯畢柯文這部著作，他為中文版撰序時亦談及此點。如果今日重寫此書，他將更加注重近代中國變化的內在動力。另外，他還談到，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改革和向外部世界開放的速度都是他當年難以想像的。這樣，「沿海」再次獲得創新功能，再次起了開拓性作用。但能否使「沿海」的種種創新「合法化」，仍是關係到此次改革開放的成敗，這是應予深思的問題。

註釋

- ① 〈與周弢甫徵錄〉，《弢園尺牘》。
- ② 王韜：《漫遊隨錄》，「走向世界叢書」（湖南人民出版社），頁98。
- ③ 王韜：〈洋務上〉，《弢園文錄外編》卷二。

沿海改革者要在沿海範圍之外產生影響，就必須獲得通向內地權力結構的入口。但既然這種權力結構充滿了大量的傳統價值、目標和行為方式，那麼他們進入這種權力結構時就得冒着改革者形象不是消失就是被沖淡的危險。

雷 頤 1954年生，1985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副編審。